



伊朗波斯波利斯考古遗址一瞥 均资料照片

◀ (上接 14 版)

其三,宗主国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关于文化遗产观点的交流和互动均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关于文化遗产的想法正是通过帝国与土著知识的不断交流而得以塑造。

该书作者之一的玛丽·比尔德指出,在不列颠群岛,“帝国与考古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比通常被认为的更为复杂”,因为那些对古典文化充满兴趣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对罗马帝国的扩张带有矛盾的否定心理。可以说,遗憾和不确定性不仅仅针对文物破坏,也针对文物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意义。18世纪后期,保护主义者已经非常厌恶摧毁了土著社会的“暴政”,认为其使得当地人口愈加贫困,而埃及财政的资金是从极度贫困的人口那里得来的;因此他们呼吁英美确保珍贵的财富归于人民,使之成为埃及未来发展和人性化影响力的来源。也正因为如此,埃及成为殖民地中第一个收回外流文物的国度。

此外,从19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在起草法律法案时,往往从殖民地的行政惯例和殖民地立法中获取灵感。例如,1892年,属于殖民地立法的“爱尔兰古迹纪念法”(1892年),被直接移植到英格兰和威尔士。更普遍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欧洲一直在讨论以与殖民主义相同的方式来治疗“高度文明的人”,因此这种转移也发生在各个帝国之间。例如,法国在1913年起草新的“纪念碑法案”时,便否定了他们认为太过宽容的所有“英国”立法,却借鉴了“印度古迹纪念法”。

就边缘地区而言,对文化遗产观的运用也成为他们对抗中心地区的手段。例如,伊朗沙阿邀请美国考古学家负责伊朗的波斯波利斯考古遗址,以便平衡英国人的势力并控制石油,从而在二战期间维护自身脆弱的独立。可以看出,反殖民主义经常为自己的目的挪用

殖民主义思想。

正是为了阐述英国文化权力内外的纠缠,该书中的章节不按地理位置进行分组,而是针对不同形式的遗产遭遇(通常是共享地理空间)的想象空间来组织的。第一部分序言结束后,第二部分从主体部分起就观察了英国与古典世界和圣经世界文化遗产间的互动。雪莱的名句“我们都是希腊人”简洁地概括了古典遗产的影响,而约克大主教则指出,“巴勒斯坦是我们的”。第三部分分析了对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场所的保护,认为该地区的历史“很少是帝国的简单产物,但更经常是宗教的产物,帝国则放大和改善了新的奉献精神”。第四部分“帝国与文明”探讨了帝国主义者如何处理从南太平洋到印度的非欧洲文明的遗产。最后一部分思考了帝国与新世界的互动,即如何进一步挑战以纪念物为中心的遗产概念,而把遗产概念扩大到濒危自然物种和人种方面。

纵观全书,我们发现仅从民族主义或者怀古的立场来探寻“文化遗产”的根源,往往会忽视国家之间和帝国结构中交织互动、多向塑造的重要性。19世纪至20世纪初,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帝国主义越来越多地被相互利用,彼此合法化,并不断地增强彼此的重要性。

最后要指出的是,该书谈到了“当地人在前殖民时代对于文化遗产的看法,往往被帝国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界定所挪用,并发生变形”,“通常被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者宣称为他们最早的民族资源”。毫无疑问,这是个引人深思、耐人寻味的问题,但这一部分却恰恰是全书论述最为薄弱的地方。不过,也正因为由于这一内容所涉及范围之广、意义之深,该书给读者和以后的研究者留下了更多的思索和探讨的空间。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如何看待数字时代的文学评论

编译/薛晓倩

评论是无关紧要的。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在他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我从未真正相信过评论。”诗人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也曾在他的一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中,从一个老龄诗人的视角写道,当放弃自身的“诗人人格”,把自己“伪装成文学评论家”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对评论本身给予多大的褒扬。当谈及对评论的“评论”时,很难找到像迈克尔·戈文(Michael Gove)所说的如此贴切的点评:人们拥有的专家已经够多了。

评论当然是重要的!不难想象,评论家们显然会这么说——当然说得也没错。评论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过滤和塑造观点。尼克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在他1991年问世的著作《你和我》(U & I)中认为:“思想史变革的主要动力是书评而不是书籍。”因为人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用来阅读所有他们想要阅读的书籍,取而代之,有些时候便选择阅读书评。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书评的影响力,包含两个问题:首先,书评是否有影响力?其次,由书评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为了证明评论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搜集一些例子,包括那些你已经听说并有了先入为主的观点的事物,和那些被你忽视的事物。BBC第四频道“周六观点”栏目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栏目会发布书籍、电影、电视秀和展览的介绍及评价,你可以收听节目,然后把认同或不认同的观点记录下来。重复几次之后,会出现这种套路:对于你不喜欢的作品,如果有某些评论试图改变你的态度(有些评论家甚至会采取错误的抨击方式),那么,在你完全缺乏经验的领域,你会倾向于接受评论者提供的意见,相较而言,涉及已经有所了解领域,你就没那么容易被说动。节目里曾经讨论过一部我读过的小说,评论的观点和我对这部小说的认识大相径庭,令我很不以为

然。同样,我也不会因为一家之言而厌烦一部电影。这证明了两点:评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其具体内容;评论也绝不是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糟糕的评论并不是指把某个作品弄“错”了,而是,并没有真正理解作品本身。

对一些人而言,评论是艺术的敌人。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似乎就持有这种立场。他告诉一位土耳其记者:“你在谈论《索拉里斯星》(Solaris,乔治·克鲁尼主演的一部科幻电影)之前,不妨先拍个电影出来。”萨缪尔·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也出于同样立场攻击了《纽约时报》影评人奥·斯科特(AO Scott)对《复仇者》(Avengers)的负面点评(斯科特的批评包括诸如“令人煎熬的”“混乱而空洞的”“臃肿的”“愤世嫉俗的”)。这次口舌之争促使斯科特写作《批评改善生活》(Better Living Through Criticism),以此作为他的诤言和防御。其中,被斯科特称为“反批评话语”的术语甚至追溯到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格劳甫。

原出版行业杂志编辑尼古拉斯·克利(Nicholas Clee)在一篇新作中也提供了他对“反批评话语”的看法,他认为大量可能不尽正确的文学批评和影响了奖项评审的言论或许导致很多杰出的作品被低估。这些所谓“杰出的”作品大部分是他本人很喜欢的犯罪小说。对于有些作品而言,评论的标准是盲目的。克利本人也内疚地承认,1993年布克奖评选时,他将一件提交上来的作品评价为“惊悚的”,其核心观点是作品“丝毫体现不出文学价值”。尽管克利的评论文章很有可读性,也有不少读者喜欢他别出心裁的各种吐槽。然而,他最终也没能达到诗人奥登(W.H. Auden)所要求的那样——一个评论家必须描绘他自己的伊甸园。奥登曾说过,一个人写诗或写小说,则伊甸园的梦想只是他自己的事,但一旦他开始写文学评论,则需要向读者描绘那个伊甸园,以便读者身临其境地去判断他的判断。

假如你同意克利的观

点,认为评论人对某些小说的评价是不公平的。那么近十五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新媒体对传统媒体行业的冲击和重塑,“评论人的观点”还有价值吗?

霍曼·巴雷卡特(Houman Barekat)、罗伯特·巴里(Robert Barry)、大卫·温特(David Winters)等合著的《数字批评家:在线文学培养》(The Digital Critic: Literary Culture Online)一书中,记者、博客写手、学者、编辑们纷纷给出了在网络时代对文学评论意义的思考。相对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结构,网络世界有一些有趣的特性,比如免费的文章、作为职业的博客写作,等等。这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网络评论对文学评论传统所造成的根本影响——如伯里所描述的那样:“线上批评快如迅雷,又极具吸引力。”他采用了一组2015年肯尼斯·戈德斯密斯(Kenneth Goldsmith)在布朗大学阅读诗歌作品之后所统计的评论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正如分析人士路易斯·伯里(Louis Bury)所言,网络时代的评论会像蔓草似地覆盖掉原始的文本,使其仅剩一个迷蒙的轮廓。当书评取代了书籍本身,评论的波涛淹没了文本本身,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了大量对当前观点进行总结的文章。这一切想起来就令人沮丧——还有多少文化交流是我们不可能追上而终将错过的?

《数字批评家》的作者们认为,评论与多个领域有关,也承认评论的内在价值。但是,我更加赞同斯科特不无焦虑的观点:“评论家们漫步在故事、图像、声音和口味等等所建构的迷宫里,一边怀疑,一边追寻有关自身经历的最终价值。我应该喜欢这些吗?这是切中鹄的的文字吗?”然而评论是否真的如他所期待的那样高贵而重要呢?有时候,我想我会更同意奥登的观点:“我从不写评论,除非别人要求我这么做……我希望字里行间都有爱,我撰写评论是因为,我需要维持生计。”

(本文选译自Chris Power在New Statesman上的文章)